



生态文学实践 助推中国文化传播

□王宁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逐步缩小与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差距。但是,我们也看到,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曾经在相当程度上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破坏作为代价的。这一点早已被一些有识之士所洞察。尤其是那些作家和人文学者对之更是十分敏感。他们或者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对过去美好自然环境的眷恋,或者直接在专著或论文中表达自己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悲伤,呼吁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保护好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环境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在中国学界方兴未艾,并逐步成为一门显学的。

通过对西方生态批评理论的译介,我们的一些人文学者进一步意识到,人与自然这个话题早就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清醒地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就生态意识而言,其传统或者说“根”在中国。很多西方作家在创作中是受到中国传统生态哲学影响的。最近读到青年学者华媛媛、李家奎的学术著作《生态之道》,就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展开研究的。这本书一方面向读者阐述了中国古代道家哲学中的生态思想,如“天之道”,即反对人类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在这一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这是目前全球正在形成的意识形态。由此,“动物解放”“动物权利”等有关动物的“叙事”已成为多个学科领域关注的热点命题。西方研究视野中,从哲学与生态学角度进入对动物伦理的考察是一个主体方向。早在1975年,彼得·辛格《动物解放》中的核心观点是,在伦理学高度上承认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均为平等”。这被视为世界范围动物解放运动兴起的标志。其他如施韦泽“敬畏生命”伦理观,汤姆·里根的动物权利论等成果,大多集中在哲学、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保护运动领域。伴随着近年来人文社科领域对人与动物关系思考的不断深化与理论性拓展,“动物研究”已经成为当下人文语境中最为流行的学术领域之一。这得益于动物伦理思维的全球性传播以及人类对于自身地位、立场与价值的重新判定。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领域,显然对于这样一个“后理论时代”世界范围内的话语转向作出了积极而又极具民族特色的回应,在建构本土话语体系、彰显民族传统生态智慧及承继传统叙事手法等向度均展现出特有的书写样貌。比如,阿来、乌热尔图、郭雪波、满都麦、石舒清等少数民族作家聚焦民间、民族文化心理内部,阐释禅佛文化、萨满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宗教文化与民间传说的宝贵资源价值。张炜、叶广岑、红柯、陈应松等作家的动物叙事书写则聚焦泛神信仰、图腾神话与民间传说母题模式的现代转换,包括万物有灵、动物崇拜、戒杀护生、弃猎行善等。这些作家的创作清晰地昭示出如何将原生态叙事纳入动物叙事文本,实现对民族原生态风格的展示,彰显文化自觉意识与本土书写经验的突出价值。如叶广岑的动物书写深深植根于民间“万物有灵”原始信仰,对社会现实与原始记忆的谱熟,使其作品体现出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并以此置换出诸种荒诞与魔幻的表述形式,为她的现代伦理观念提供丰富的文

中心主义的“工具价值论”,主张非人类生物甚至非生物的自然界都具备“内在价值”;另一方面也通过细读美国的自然文学旨在告诉人们,中国古代的这些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早已为西方作家和批评家所接受,并成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书中所提及的尤金·奥尼尔、加里·斯奈德、勒古恩等美国现当代作家不仅有意识地接受了道家的思想,而且还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阐发。比如,奥尼尔在戏剧创作中汲取“循环回归”“阴阳和合”“齐物论”等道家思想。他们的文学实践有效地助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和接受。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我认为,探讨中国文学和人文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应该成为今后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此外,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也使我们感到,生态文明建设应该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也即我们不仅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没有后者,前者也无法持续下去。

我们都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提倡生态文明建设,就要切实从其基础抓起,也即首先要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关系,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来反拨人类中心主义的专断和排他意识,使人们重新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环境的理念。尽管我们深知,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哲人那里大多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但由于人类在过去的数百年里不断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而没有善待自然,因而使得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到了相当程度的破坏。毫不奇怪,自然也向人类发起了无情的报复。因此,正如青年学者们在《生态之道》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中国从古代绵延至今的生态思想为全球生态学提供补充或提供可供借鉴的替代性参考框架。这部专著通过揭示中国古代生态哲学在美国文学中的接受来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建立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自己的贡献。

今天的自然生态研究者和生态批评家在讨论自然生态这个话题时总免不了要提及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文学的先驱梭罗的散文作品《瓦尔登湖》。确实,梭罗作为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和现代环境保护主义的代表,认为人除了必需的物品外,即使其他一无所有也能在大自然中愉快地生活。他的这种近似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境界也许是今天的人们很难做到的,但梭罗的这种尊重自然甚至对其顶礼膜拜的精神至少对今天的人们有着启迪作用。中国的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效法梭罗,远离都市的喧嚣,隐居在荒山野岭,静心地思考和写作。还有人出于保护生命的动机成了素食主义者。这些在我看来都是试图建设生态文明的初步尝试。但是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在一个具有各种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提倡梭罗式的素朴生活,至少是对奢靡喧嚣的都市生活的一种反拨。

作为中国的生态文学和环境研究者,我们更应该重视从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道家哲学中发掘出丰富的生态学思想,通过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实现与国际学界在这一层面上的对话,从而真正为改变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理论消费”大国的形象。从《生态之道》的讨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哲学中有着丰富的生态学资源,并对西方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影响。但长期以来由于翻译的缺席,这些思想仅为少数汉学家或关注中国的生态环境研究者所知,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把学术成果翻译为英文发表在国际刊物上,扩大中国思想的影响力。最后,我想再次重申我一贯的看法: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大国,中国应当对全球经济作出重要的贡献,中国更应当对世界文化和生态文明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成果问世。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



自然文学的重要价值及其现代转型

□牛学智

自然文学为何越来越受关注

什么是自然文学呢?自然文学不是自然主义文学,而是生态文学。一言以蔽之,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就是自然文学。自然文学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强调人在保护自然方面的责任和担当。自然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作家李青松所论述的,这种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自然对人类的影响(物质、精神),另一方面是人对待自然的态度,人在自然中的行为。(李青松《自然文学的使命和境界》)今天,我们为什么尤其需要自然文学?

其一,经济上,进入现代以来,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成为全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经济主义价值观成了全球的流行导向,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乃至人与人的关系持续恶化,乃至到了自然周期性报复人类的地步。提倡自然文学,虽然不至于有立竿见影的作用和力量,但起码会唤醒人们注意,自然的破坏力有时候恰好是人对自然的恶劣态度造成的。

其二,文化上,一直以来至少有两种突出的文化态度,强有力地左右着我们对自然的態度。一是古典浪漫主义态度,强调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并由此衍生出敬畏自然、跪拜自然的泛神论色彩的自然观。它强调人在自然中渺小如尘埃,乃至提倡人在自然面前不应该有主体性。二是主张人定胜天的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必须把自然改造成人所想要、所希望的样子。这势必导致人们干出一些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来,人被打造成了自然的对立物和对抗物。这两种文化观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但它们却异常强有力地镶嵌在我们的脑组织中,影响甚至左右着我们与自然的關係。提倡自然文学,通过正常状态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可以告知人们,常态的人性,就是常态的人与自然的關係。

其三,文学上,我们有一段特别强调文学的自律性,认为文学的不自自由是因为它受政治思维的过多束缚。但当文学走出政治思维之后,却又陷入了个体本位的私人主义空间,文学变成了个人倾吐欲望、彰显潜意识的渠道。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找不到生存坐标,找不到归属感。提倡自然文学,可以让作家们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关注此时的社会人生,更好地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再度深入思考人何以为人的文学母题。

既有自然文学给我们的价值启示

20世纪之前的西方自然文学有着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其作者对自然持乐观进取的态度,希望从中寻求个性的解放、文化的根源和精神的升华,但是他们的思索与写作的着眼点仍限于自然与自我的范畴。到了20世纪,随着诸如约翰·巴勒斯、约翰·缪尔、玛丽·奥斯汀等作家的出现,自然文学才展开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前景。这时的自然文学开始展示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自然文学放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提出了旨在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土地伦理”。利奥波德写作的《沙乡年鉴》就是如此。作者以一个生态学家的学识,讲述了土地金字塔、食物链等原理,说明人类只是由土壤、河流、植物、动物所组成的整个土地社区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个社区中,所有成员都有其相应的位置,都是相互依赖的。他要人们“像山一样思考”,即从生态的角度,从保持土地健康的角度来思考,培养一种“生态良心”。

其次,自然文学渗透着强烈的“荒野意识”。在自然文学中,对荒野的看法和认识贯穿始终。爱默生指出:“在丛林中我们重新找回了理智与信仰。”梭罗声称:“只有在荒野中才能保护这个世界。”约翰·缪尔认为:“在上帝的荒野里蕴藏着这个世界的希望。”利奥波德把从荒野中得到的精神享受,视为一种比物质享受更胜一筹的高质量的生活,是一种像言论自由一样不可剥夺的人权。爱德华·艾比则把荒野



构建动物叙事的崭新话语体系

□陈佳冀

化理论依据,其创作已然站在超越人类利己主义和虚幻不实生命伦理高度,以独特的视域体察生命物种的本体价值、达成动物保护层面的情感寄托,显示极大的道德勇气。除此之外,方敏、京夫、李传锋、黑鹤、金曾豪、姜戎、冯苓植、雪漠、杨志军等作家也都在各自题材领域迈出属于自身特有的叙事探索与类型创新的坚实步伐。

但也不可否认,作为一个新兴的话语领域,试图让动物跃居前台,自在而惬意地展示自身的主体性(包括其生命、生存和权利的所属等),动情讲述生命自身独特而动人的故事,中国作家们尚处在一个不断适应与磨合的进程之中。通过“动物叙事”的话语范式发掘更为深刻、复杂的伦理内涵,这有待于作家们真正走近其所要描摹的动物对象,以深入在场的创作姿态、情感体验与价值蕴藉展开深入探索。在自身创作能力的提升方面,包括对题材边界、物种属性、表述范畴、伦理视域以及视角选择等维度的强调,也是动物题材创作成功与否的关键要素。在进入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版图中,动物题材的相关创作正以其特有的题材优势与多向度的伦理诉求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一隅,特别是这一小说类型在对当下诸多亟待解决的时代课题的回应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不同创作立场的秉持、不同文体形式的选择、不同叙事角度的介

入……无不彰显“动物叙事”自身所蕴含的丰富而博大的心灵容量。借助于动物形象的有力塑造与精心书写,由动物物种的伦理维度,延伸至对自然与时代的话语映射,饱含浓厚的人文关怀与深刻的价值评判,这几乎成为了这一小说类型共通的叙事追求。而其所涉及到的诸多重要主题往往能够深入人的内在伦理视域,米兰·昆德拉曾在《相遇》中说,“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丑陋的镜子)”。作为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对动物及其相关形象的书写与展览也必将永恒地持续下去,并自始至终如明镜般映照出当代人有关人性、生态、命运、民族与文明等话题的思考与追问。而其最终试图达成的,正是对于世态人心的拯救、对于人类情感意识深处良知与善性的启发,实现对人的本真信仰内核的重塑与自我精神家园的构建。正如查尔斯·罗伯茨在《野地的亲族》自序中所言:“动物文学有强大的解放力量,……它的深远意义将日益凸显”。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一独特的书写类型,抱以足够的期许与热望。而从研究的维度,前期国内大部分研究成果多是与译介、评析西方动物叙事、文艺学理论方法建构有关。研究的真正勃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发展至今已形成一派蔚为大观的学

术局面。目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涉及面广,通过检索中国知网,迄今发表动物叙事(或批评)的论文有2000多篇;以动物叙事等为选题的硕博学位论文仅2019年就有20余篇。目前研究已涉及到生态学、人类学、伦理学等研究方法与学科视野,对本体、意义与精神流向等方面均作出回应,但也留下进一步研究余地。比如,国外研究涉及中国动物叙事的成果尚显少数,国内研究不乏宏观意义的考察,但缺少从叙事成规与话语形态角度进入,以阐明动物叙事“类”的特征与属性;对当代动物叙事内在发展规律的梳理,尚缺乏明确阐释,难以窥见动物叙事内部发展的叙事奥秘;在新时期的思想背景下,动物叙事如何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结合,借鉴西方动物理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学研究新形式,彰显与当代现实相结合的本土意识,仍需要扎实的语体体系建构予以推进。

比如,在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野中开掘传统文化遗产,阐发当下动物叙事创作如何在中国传统话语资源中寻找有效切入点,以本土的叙事模式与话语形态,实现与生命命题的对接,在西方文学参照下完成动物伦理的本土化叙事转换。通过动物批评理论与文本细读的有机结合,建构当下动物

叙事的本土话语体系,确认哪些代表性作家为动物叙事的本土化书写建立了写作范式、主导了自进入新时期以来动物文学的整体发展脉络,充分展现其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当然,更为关键的是,与正在展开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紧密相连,彰显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价值立场,构建民族性动物话语体系内核,为解决动物保护与生态难题贡献中国智慧。

在传统小说观念影响和动物叙事的类的规约制衡下,中国动物叙事创作既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更具有鲜明的地方民族志特色,探讨其发生机制,把握动物叙事创作的基本叙事规律,有助于正确引导该类型文学作品的创作、接受和出版。在新时期背景下介入当代动物叙事的话语论域,有益于构建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重铸生态人文精神,给予全社会丰富的历史文化滋养,为世界环境保护和生态可持续发展提供镜鉴。而解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提炼动物叙事新理论命题与标识性概念,将为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思想、文化、精神和智力支撑,对于进一步弘扬传统生态智慧亦具有一定的价值。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本土“动物叙事”可以突破自身的创作瓶颈与各种障碍,闪现出夺人眼目的独特魅力,直面社会现实与当下时代主题,涵括人类与动物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蕴,构建具备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动物话语体系,彰显其在世界动物文学整体格局中的特殊价值与重要贡献。(作者系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